

阎铁军 刘政 刘璋◎主编

中国政治思想的 反思者

——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

学六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赞助

阎铁铮 刘琰 刘珞 主编

中国政治思想的 反——思——者

——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

学术卷

刘泽华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的反思者：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
学术卷 / 阎铁铮, 刘琰, 刘珞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
出版社, 2022.6

ISBN 978-7-310-06268-3

I. ①中… II. ①阎… ②刘… ③刘… III. ①刘泽华
—纪念文集 IV. ①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0930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政治思想的反思者——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DE FANSI ZHE
—LIU ZEHUA XIANSHENG JINIAN WENJI (XUESHU JUAN)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陈敬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https://nkup.nankai.edu.cn>

雅迪云印(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22年6月第1版 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240×170毫米 16开本 21印张 4插页 377千字

定价:168.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8339

《中国政治思想的反思者——刘泽华先生纪念文集》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余新忠

编委会成员：江 沛 葛 荃 孙晓春
林存阳 刘 琰 刘 珞

目 录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 王学典 郭震旦	1
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 / 刘泽华 李振宏	7
对刘学的管见	
——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为例 / 张铨根	23
刘泽华与“刘泽华学派”	
——沉痛纪念著名中国思想史家刘泽华教授 / 陈寒鸣	30
正气与笃实	
——刘泽华先生的学术人格 / 葛荃	79
以现代情怀拥抱历史	
——写在《刘泽华全集》出版之际 / 孙晓春	84
百年典范的意义及其局限	
——评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 杨阳	87
青史无愧 丹心可追	
——略说刘泽华先生治学特点 / 邵鸿	97
学术独立, 思想永恒	
——写在恩师刘泽华先生《全集》出版发布会之后 / 林存光	100
中国思想史的双面故事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续说 / 林存光	121
刘泽华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及其建构 / 林存阳 李文昌	132
刘泽华先生论“胆” / 林存阳	150
史料、时代、使命与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集》读后记 / 秦进才	152
刘泽华先生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范式的历史视域与史学方法 / 张师伟	176
他仍然值守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岗位上 / 郭震旦	189
早期儒家思想之道、王关系的变迁	
——从传统政治文化的“阴阳结构”论起 / 李洪卫	193
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容与方法 / 李宪堂	220

“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

——理解刘泽华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角度 / 刘丰…………… 235

《周易》辩证法的内在缺陷与王权主义的“阴阳组合结构” / 魏福明 …… 248

王权主义与社会形态等问题的再思考

——访刘泽华先生 / 陈鑫 采访整理…………… 258

走出“王权主义”的阴霾

——访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 / 郑士波…………… 267

刘泽华与历史认识论研究 / 王丁…………… 276

刘泽华先生学术年表 / 王丁…………… 293

后 记…………… 327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

王学典 郭震旦

众所周知，以刘泽华先生为旗帜的“王权主义学派”已经成为海内外引人注目的一支研究力量，而这套新出炉的由刘先生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启蒙史学所取得的又一项代表性成果。这套大书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基本立场，充分体现出“刘泽华学派”尤其是刘先生本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所持的独特认识。鉴于它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愿借此机会对启蒙史学本身做一个思想史、学术史的考察。

一、奋起与坚守：启蒙史学的简略回顾

说启蒙史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思想解放大潮中一马当先，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一史学形态的两大代表人物，无论是黎澍先生还是刘泽华先生，都是整个新启蒙运动的急先锋。当黎澍先生举起启蒙大旗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启蒙史学堪称是中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四人帮”甫一倒台，黎澍先生迅即以《历史研究》为阵地展开了他的启蒙之旅。在 80 年代新启蒙的大合唱中，黎澍先生是为数不多的领唱者之一。在席卷整个 80 年代的启蒙运动中，黎澍事实上充当了一个盗火者和擎旗人的角色。是黎澍率先将对“四人帮”的批判深化到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批判，他对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的讨伐，为徘徊中的中国思想界指明了方向，并推动思想界、舆论界在 1980 年前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封建主义”的高潮。正是黎澍对一些流传深广、习以为常的教条的宣战，大面积刷新了唯物史观，促使理论界为开始摆脱极端僵化的斯大林体系而开辟新路。

刘泽华先生堪称启蒙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发表的数篇文章，均似投枪匕首，在整个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

影响，发出了新启蒙的最强音。

1978年6月，全国历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刘泽华先生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宣读了《砸碎枷锁 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的论文，对极“左”势力在史学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大声呼吁：必须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理论、历史事实再颠倒过来，必须对被“四人帮”进行了错误批判的予以批判；要冲破极“左”势力在思想学术上设置的许多“禁区”和“禁条”，切实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重新评价一切。这篇文章甚至提出，在历史科学面前，没有终极的真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也不能字字拘泥。该文的发表，对史学界冲破教条主义的禁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9年，刘泽华先生与王连升合作在《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一文。该文冒着“砍旗”的罪名，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将秦始皇抬至云端且加以神话的做法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其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具有隐喻意义论题的论述，来揭示弥漫于“文革”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同年，刘先生又与王连升合作，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发表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继续拓展启蒙史学的阵地。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真正动力的命题，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但在刘泽华先生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命线，也是从根本上制约历史研究的“旗帜性”问题，必须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挑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力排众议，认为生产斗争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因此生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把阶级斗争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本末倒置。此文乃是第一篇对史学界长期以来盛行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说予以否定的文章，其启蒙意义自不待言。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已是常识，而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维护常识常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常识的归位，往往代表着文明的飞跃。

三篇文章，犹如三支射向“现代迷信”的利箭，成为启蒙史学的代表性篇章。哪怕是在三十多年后重读这些文章，人们仍能感受到执笔者无畏的勇气和不屈的灵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启蒙史学大放异彩的时候。这也是最让史学从业者感到热血沸腾的一段时光。可以说，以黎澍、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启蒙史学在思想解放大潮中所起的作用，堪与西方启蒙史学在西方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启蒙史学以批判专制封建主义为靶向，以廓清现代迷信为突破口，为当时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如果说当代中国史学曾经有过无愧于时代的表

现的话，这一荣誉恐怕只能属于启蒙史学。作为启蒙史学的杰出代表，刘泽华先生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抹杀。

最富有价值和长远意义的是，刘泽华先生在他的专业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启蒙的思想和路径。这就是他对王权主义的有关论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刘先生孜孜不倦地解读他的王权主义，试图通过王权主义来剖析数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控制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华夏古国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和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进而阐明与上述状况相对应的王权主义观念体系。可以说，对王权主义内涵的深入挖掘，暴露出数千年中国社会运行的玄机，找到了破解中国历史规律的密钥。这一重要学术发现的现实指向是不言而喻的，从中也可窥测启蒙史学对现代化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王权主义论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是启蒙。

二、启蒙史学面临着与 80 年代大相径庭的语境

相对于激情燃烧的 80 年代，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始，学术取向发生了巨变，文化保守主义声势日隆。改变或许来自官方与学界两端。从官方层面说，笼罩着整个 80 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对既有治理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支持重视秩序和伦理的国学（儒学）成为新的选择，孔子重新被请回曾被逐出的圣殿。国家意识形态的转移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腾出了空间。

从学界来说，90 年代之初，在普遍的失落感当中，一部分学人开始对 80 年代进行反省，转而对 80 年代采取了落井下石的态度，使得知识界风气骤然大变。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先是慢慢酝酿，随后破门而出，很快就呈现出沛然莫之能御之势。强调文化认同的保守主义开始占据学界主流。其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是曾主编“新启蒙”丛书的王元化先生的转向。早在 1994 年初，《中国时报周刊》一篇轰动一时的专题长文就已指出，“执掌中国大陆思想界大本营的北京知识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令人们惊讶的是，80 年代对西方的膜拜，被 90 年代至今的中华文化优越感所替代。在最近二十年间，新儒学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并最终占据了学术的中央地带。

质疑不仅指向 80 年代，同样也指向启蒙。启蒙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个对象。2005 年，杜维明和黄万盛在《开放时代》发表对谈《启蒙的反思》，宣称“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儒家不是游魂，一切世间的组织、结构、理念、行为、运动，都是它发挥“法力”的“道场”。这些反思自有其合理之处，但其贬抑启蒙弘扬传

统的立场是不言自明的。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已开始呼吁在中国进行“反启蒙”，希望通过“反启蒙”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平衡。

对另外一些学者来说，启蒙似乎应该让位于治学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学问凸显，思想淡出”之风的流行。早在1991年1月，一部分学者就聚集到一起召开了一次学术史研究座谈会，倡导一种“不问政治”“遗世独立”“为学术而学术”“政学分途”的治学态度。此风迅速蔓延，响应者众。“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维护书斋的高贵与独立，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大分化和大重组了的思想学术界，新启蒙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启蒙竟然被搞得声名狼藉，这是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一个蕴含着巨大反讽意味的事实。

除了以上两端，物质主义的泛滥也使启蒙话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催生，社会中有些人对财富的追逐呈现出飞蛾扑火般的狂热，攫取和占有财富成为某些人人生的重心。按照学者所言，物质主义者评价财物及其获得高于其他事物和生活的活动，物质就是他们的价值。在极端的物质主义语境中，一切的崇高都被消解。启蒙也由80年代的众声喧哗衰退为少数人坚守的精神奢侈。

今天，环顾海内，很难再找到像刘泽华先生这样孜孜矻矻三十多年坚守启蒙立场的学人。面对这样的环境，刘先生对启蒙立场的坚守或许更值得我们感佩。三十多年来，迫于现实压力或随着研究取向的变化，启蒙史学的队伍一直在不断缩小，一些曾经的领军人物，近些年也开始从启蒙立场退却，只有刘泽华先生仍一如既往地毅然前行。刘先生的这种风骨，令我们想到了当年鲁迅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坚守。

三、制衡文化保守主义：启蒙史学的启示与前景

百年来，启蒙在中国步履蹒跚，屡次中断，民主和法治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和民族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被外力打断，因此，从思想史角度说，80年代并未终结。这一点，也可从近期回望和怀念80年代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得到证明。因此，秉承“五四”或者说渊源于“五四”的启蒙史学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西方的启蒙运动持续了一二百年，中国又有“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专制的包袱尤其沉重，因此启蒙仍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在快速推进三十多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古今、中西、“左”“右”之争重新泛起。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先生当时的观点，启蒙在

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能否再次启动启蒙，实现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这一情势，必将给具有强烈现实意识、天下情怀的启蒙史学拓展通路。

必须承认，启蒙可以受到冷遇，但启蒙所关心的问题并不会消失，其中有些问题还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暗礁巨垒。经济的大规模扩张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也许会更加敞豁地暴露其在政治上需要发展完善之处。未来的中国改革，仍然需要启蒙来提供思想动力。大转型的历史性巨变，仍将会推动知识人继续寻求正确的启蒙之道。

鉴于当前的语境，未来的启蒙和启蒙史学也许将更多充当对文化保守主义进行制衡的角色。近年来，在官方和学界的共同推举之下，复兴国学的呼声呈压倒之势。在这种情势下，启蒙史学在 21 世纪初叶，竟然与国学派进行了两场论战（这里是指 2005 年“刘泽华学派”与陈明等人以及 2010 年围绕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与纪宝成等人进行的论战），这充分展示了启蒙史学在当下的活力。也许正是有了启蒙史学的质疑，才会避免出现对传统文化过分的乐观和浪漫主义的想象。刘泽华先生多次在文章和访谈中澄清，自己绝对不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他并不反对研究国学，不能笼统地说他是反对国学。他与弘扬派的主张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待国学的态度应该是弘扬还是分析？二是把国学当作我们的文化主体还是作为一种资源？他只是不赞成笼统地讲弘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刘先生除了坚持一贯的启蒙立场外，还呈现出富有建设性的一面。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上，他的观念中是允许经过淘洗的传统文化存在的。这种态度也许暗含着启蒙史学在变迁了的语境中的新作为：以批判为方法，以建设为目的——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分析 and 批判，构建崛起的中国新文明。这种新走向，也许与许纪霖提出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的路径相契合。绵延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实际包含着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如何实现一种既不脱离世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道路。如何在文明转型工程当中不断反思自身并坚守启蒙的价值，人们期待着启蒙史学对这一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从长远来看，启蒙史学仍将作为现实的一个批判者而存在。刘泽华先生经常谈到学术与现实的互动，他对中国政治思想所做的王权主义的归纳，实质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和“现代专制主义”的感受之上的。一个在思想上没有不同声音的学术界是令人忧虑的。在学术文化领域，不同的意见，多元的观点，几乎是维持观念世界肌体健康的保障。一个保持批判眼光的启蒙学派，将会是当下和未来文化建设难得的诤友。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启蒙仍是当下中

国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一支劲旅。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学典（1956—），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现代学术史研究。

郭震旦（1966—），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

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

刘泽华 李振宏

一、“学派”对于中国学术的意义

刘泽华：李教授，《文史哲》第4期竟然打破常规，在首篇刊出了你长达四万字的文章，这让我非常吃惊。究竟其意义何在呢？我个人揣测，李教授和《文史哲》的诸位决策者都意在学术界提倡“学派”。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在要提倡“学派”呢？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除了官方认定的一个学派外，其他的基本上谈不上什么学派了；即便有一些“学派”苗头的，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于是，大多数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圣人发言了，就紧跟圣人；圣人不讲话了，就紧跟贤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也并非完全出于被迫，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认同的；即使有心存异议者，多半是沉默或进行自我批判——历史学界重量级的学者几乎都有自我批判的文章。“文革”结束以后，大的环境出现了变化，学术界又开始思考问题，对不认同的观点提出疑问，并且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但也不时会出现一些要“统一”思想的声音。从政治家的初衷来说，在政治组织内部对其成员的思想行为做出规定，予以约束，从而形成统一意志，是有其正当理由的。但是，由于中国语境下的政治与学术边界模糊，政策执行者容易混为一谈，使得学术研究深受影响。以历史学为例，哪些人物、事件可以肯定，哪些人物、事件可以否定，不否定是否就都是肯定，不否定是否就不能分析；如果允许分析，到哪一步是允许的，到哪一步是禁止的，由谁来判定，等等，这些都涉及一个历史认识的大问题。另外，现在还有一种“交学费”的观点很盛，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进行探索，都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所交的必要学费和应付出的代价。这类认识固无不可，问题是不准与之相左的看法公诸于世。这就让人感到害怕了！难道学者都

得沿着这个思路去思考、去认识？所以，我想请问李教授，你现在提出“学派”问题，用意何在？

李振宏：我之所以要提出“学派”问题，并提出一个以您为首的“王权主义学派”，并不是出于对您个人的感情。刘先生的大名我虽早已耳闻，我对您也非常敬仰，并且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受到过您的影响，但过去我们之间并没有交往，而且我也不习惯于为某个人做事。我之所以提出“学派”问题，而且要张扬一个“王权主义学派”，出发点在于推进当代的学术发展。

在我看来，任何学术都是要在充满活力的学派林立的局面中获得其生命力的。如果没有不同学术理念、不同历史观的认知、不同学术风格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对立和争鸣，学术生命就会窒息。对此，古人深谙其道。《汉书·艺文志》开篇就讲：“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所以，孔子（前551—前479）死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一个学术的创始人死了以后，他的思想是一定要分化的。这个分化的最终结局，就会形成不同的学派。其本始是一派，派中又分派，这是必然的现象。正是学派的对立和争鸣，推进了学术的发展。马克思（1818—1883）逝世后，继承马克思的人，或者有志于学习、研究马克思的人要不要分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不同人所理解的马克思都只是他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于是，在理解研究马克思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这些学派的对立与争鸣，就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这是学术发展的正道。如果不是这样，只有一种声音，那学术怎么发展？而学派的对立和争鸣，是要靠形成一批相对稳定、集中的学术共同体来实现的。这个学术共同体就是学派嘛！只有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才能把某种学说、某种理论、某种学术思想推向一定的理论高度，创造具有相对完整并付诸实践的、能够经得起检验的一种理论体系。单个人是没有力量来完成这些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有相对一致的问题指向、选题指向，有大体相同的学术理念，有相同的历史观认知，有相同的方法论，它在这个领域的开掘会达到相当的深度。这是学术共同体的作用。有这样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对立和争鸣，自然就推进了学术、繁荣了学术。所以我想，只有学派林立的学术时代，才可能是学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中国史学界在过去几十年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开了“五朵金花”（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结果怎么样？后来都败落了吧，现在人们很少知道或提起“五朵金花”了。起初还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把它的研究进程打断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们又重操旧业，重开了“五朵金花”，结果没开多久就枯萎、败落

了。为什么？因为它根本上还是一种声音。比如，关于“古史分期”好像有八家学说，其实都属于五种形态史观之内。按照我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同株异叶”。一棵树干，生长出不同的枝叶，只要树根树干出了问题，那所依附的各种枝叶也就都枯萎了，哪一派也活不下去。古史分期就是这样的结果——当五种形态史观受到挑战后，以此为理论的各家学说也就统统被置于尴尬的境地。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就是想在学术界产生一些不同的声音，张扬一下学术的个性，并最终实现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这是我的初衷。

刘泽华：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学派”如何界定？比如说，一种思潮算不算学派？近年来的“国学”热，新儒家与尊崇儒之风很盛，以及新道家等等，算不算是一个大学派？还有，许多认识领域的开发，也有相应的理论。比如，社会史、文化史等，算不算学派？所谓“学派”，你主要是看价值体系，还是认识领域和认识体系（解释体系），抑或三者的交织？

李振宏：按我的理解，“学派”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如果要下定义，就不一定能说得很精确。大体说来，就是在同一个学科中由于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学术理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学术派别。一个学派，就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即一个由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共同的方法论思想（即解释体系）和坚守共同认识领域的人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学派是否成立，主要看几个要素。（1）有共同坚守而又区别于他人的价值观体系和系统的方法论思想。在历史学范围内说，就是有共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2）有共同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宗旨，亦即学术目的性问题。（3）有共同的概念体系或话语系统。（4）有明确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如果是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所体现的学术共同体，就可以称之为学派。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现代新儒家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学派”的。他们确实有一致性的价值观认同，有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宗旨，有他们的概念体系，也有比较突出的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而那些所谓“国学”热以及强盛的尊儒之风，就算不上什么学派了，仅仅是一种思潮而已。它们甚至都划不到学术的范畴内，只是一种思想或观念的浮躁和喧嚣。而文化史、社会史则只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角度或方法，是从特有的视角观察历史所形成的不同学术路径。文化史或社会史尽管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有很多从业人员，但其从业者并不一定在历史观、价值观、治学宗旨、学术理念上与其他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相区别，如果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史学派”“社会史学派”也无大谬，但严格地说，是不具备学派的基本要素的。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说，判断学派问题，最重要的是历史观、价值体系、解释体系、治学宗旨这样几个要素。这里申明一下，人们常说的“文化史观”，无疑是一个学派。

刘泽华：谈到学派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关注历史的“真”。但是，“真”在哪里？比如，在讨论近代史从何时开始这个问题上，有宋朝说，有明末说，有鸦片战争说。这算不算学派？又如，近代以来，有现代化为主流说，有“挨打”为主流说，还有既“挨打”又输入现代文明说。这些算不算正常的学派？再如，经常会有一些有权势的人凭借权力而形成学术垄断，这算不算一个正常的学派？中国传统史学中是很强调“正统”的，而越是“正统”，假的东西越多，是否“正统”也算是一派？

李振宏：历史研究是以求真为前提的，只有弄清了历史之“真”，才可能从真实的历史中提取出可靠的历史借鉴。但是，问题的诡异之处就在于，什么是历史之“真”？历史之“真”在哪里？不要说带有解释性的历史认识，就是纯粹客观的历史现象，我们都难以捕获。归根到底，客观的或解释的历史，都需要通过史学家的头脑来发现，来表达；而一旦经过了头脑，不同的头脑解释或揭示出来的东西，就一定不会是同一个面貌。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我记得，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讲座中，就曾谈到过历史事实的问题。您说，每个历史学家都说自己是凭事实说话，但事实在哪里？同一个历史事实，拿在不同的人手里，就是不一样的事实。当然，这不是您的原话，但大意如此。我是从别人的录音磁带里听到了您的演讲，很受启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我们面对的是消失了的对象，对它的解读不能不打上无法清除的主观性印记。给历史以解释，在解释中倾注我们全部的主观能力，这是历史学家特有的职责和权利。于是，在近代史的开端问题上，就出现了您所说的宋朝说、明末说、鸦片战争说等；但这些不同的说法，并不一定是由于历史观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的结果，也不一定是方法论的问题，其实就是对材料的解读问题，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等概念的理解问题，它是由个人的思想观念、学术修养、认识能力等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这些就是一般的学术观点的不同，不一定都上升到学派的高度去认识。

关于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或解读，过去传统的说法就是“革命史观”，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现代化史观”，最近有些人在批“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把“现代化史观”上升到需要大加挞伐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高度，这些是不能称之为学派的。“革命史观”是政治为学术规定的解读路径，不属于学术的范畴，而政治与学术之属性不同则是不需要论辩的。最近看到一些报道，某个搞政治的人，去一个高等学术研究机构做讲座，批判某些学者“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其实，那些完全从政治出发的大批判，才真正是穿着“学术的隐身衣”，而没有一点点学术的味道。“现代化史观”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就目前情

况看，表达这些看法的人似乎还没有形成一种学派，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不一定要从学派的角度去认识。

在近代史研究中，坚持“革命史观”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身并非政治家，却用政治家规定的思维路径去“裁剪”历史。这些人由于缺乏思维的独立性，对“学术”为何物并不理解，当然是谈不上学派的。另一种是，如果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在自己真诚的学术研究中抽象出了一个“革命史观”，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那是可以称之为学派的。

一个学派的基本要件，或者说正当性与合理性的主要支点，在于它是独立思考、思想自由的产物，而不在于它的观点和理论本身。如果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形成的学术群体，无论它与政治家的宣传多么相似，它也是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的。因为，它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是认识的常规产物。我赞成恩格斯（1820—1895）的观点：“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①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中，不要轻易判断什么是真理与谬误，从自由思想场域中产生的任何观念、观点，都要肯定其正当性。其实，说穿了，正统不正统，不在于观点本身，而在于你是不是以独立思考、自由思想为前提，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具有学术的本性。

刘泽华：如果“学派”丛生，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于同一个问题各有自己的答案或解释，历史的“真”是否会被“异化”，还是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学派林立是否会引起人们对“历史学”的怀疑——历史是否会成为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是否就会变成民间艺人——“说书人”口中之物，只是给人以乐趣而已？

李振宏：您提的是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其实正是学术的魅力之所在，正是学术的生命力的表现。

事实上，每个历史学家都是从一个特有的角度去认识历史，都只是提出对历史的一个独特的认识，因此，每个人的认识，都只是看到了历史的一个方面，再聪颖、再智慧的人也不可能洞察历史的全部真相。我们都来认识历史，你看到了历史的这个方面，我看到了历史的那个方面，他看到了历史的另一个方面，不同的历史认识汇集起来，对历史的认识就更加丰富和全面。因为，真实的历史就埋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历史解释之中。所以，学派丛生所造成的不是历史的异化，而是历史学的繁荣，是历史之“真”的充分揭示。只不过，在中国，这是人们还不太适应的学术场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3页。